

法 國 革 命 史

郎 醒 石 張 國 人 編 譯

上 海

民 智 書 局 發 行

944.04
DU11

History of French Revolution

by

Lan Shing Shih

Chang Koo Jun

The Intelligence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法國革命史(全一册)

定價
精裝 一元二角
平裝 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編 譯 者

張 郎 國 醒 人 石

印 刷 者

上海塘山路三十一號
民智印刷所

發 行 者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
民智書局

分 售 處

漢口湖北街漢潤里十一號
武昌省政府前
民智書局分局
杭州 壽安坊
廣州 永漢北路

總 發 行 所

上海河南路中市
民智書局
九十九至九十一號

發(一三三五)

序

中國尚沒有一部完善的各國革命史，尤其沒有一部從三民主義的立場來編成的各國革命史，這是誰都感覺到不滿的事實。我自己雖懷了編述各國革命史的志願多少年，可是工作繁忙之中，終於沒有絲毫成就。一直到了去年底，展覽，哲生，兩先生邀我一同出國考察國際政治經濟情形的時候，閒談之中，提起這事，我纔擬定將各國革命史分別編成叢書的計畫，先以美，法兩國的革命史屬諸郎醒石張國仁兩同志，俄國革命史屬諸楊幼炯同志。今年九月，我們從歐洲回來，他們編著的工作，早已成就了大半，而法，俄兩國革命史亦已付梓。這雖屬一點文字小因緣，但我相信這一部叢書是本着三民主義的立場編成的；如其不信，我們且將醒石和國仁兩先生的法國革命史先批評一下。

革命終於缺少不掉兩個基本條件。其一，必須舊社會組織之崩壞，不管這舊社會是神權制也好，封建制也好，軍閥制也好。其二，必須全社會不分階級的覺悟分子，集合成長一新的革命勢力，以全社會的福利爲其革命的目標，而沒有絲毫個人主義的因素裹挾於其間。有了這兩個條件，革命是不可抗的；缺乏這兩個條件，革命是不需要的；二者缺一，革命是不會成功的；二者之中，後一個條件裏發生了個人主義的趨向，革命是要中途遭受挫折，須經長期的顛播才能獲得相當成就的。法國革命，就是由備具這兩個條件而爆發，可是中途遭了個人主義衝突之打擊，所以經過八十年長期間之反覆奮鬥

，也不過成就了一個代議制的共和主義，而回顧革命初期盧梭一輩先哲所預期的民主主義，事實上猶覺遠隔十萬八千里。

這一個論斷，有整個法國革命史做實證的。（且看十八世紀的法蘭西，物質上是承襲了以前的農業封建制，政治上是地主教皇國王三根撐天柱。以如此之農業封建制扶持着這三根撐天柱，這就是當時全歐洲的傳統社會組織。但是十八世紀下半期，歐洲已發生一種新的文化勢力，而其表現就是城市之繁興，基爾特制度下小工業之勃起，和商人主義下殖民事業之發展。這些新勢力，一方面暴露了傳統的封建社會之崩潰和弱點，一方面培植起中等階級和智識階級的勢力。法國以地理位置比較地優越，國家基礎比較地確定，而君主專制也比較地嚴酷，所以革命思想之發生比較地迅捷於其他歐洲各國，正非無故。因着歷史的自然趨勢，法國城市之繁興，小工業之勃起，和商人主義之發展，所培植起來的新勢力當然唯有中等階級和智識階級，而它們便是革命的中心。它們並不是有什麼階級思想的，而且很能夠站住一個為全民福利求改革的立場。它們所企求的是要推翻那植根在農業封建制上的地主教皇國王三根大柱，而將國家新組織改建在農工商各階級的全民基礎上面來。當時這些革命勢力，真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為全國人民求福利的；甚至以貴族出身的孟德斯鳩，教會出身的福祿特爾，也本着這種精神，與貧賤出身的盧梭，一致排擊君主貴族教會的特權。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五日，革命的勢力在國民會議與僧侶貴族君主的舊勢力開始鬥爭，其後更挾着一個為全民利益而革命的普遍思潮結

品了一個人權宣言，這時候的革命目標是何等顯明，平民的革命情緒是何等熱烈！貴族與僥倖的舊勢力，在這時候革命高潮的面前，已經由發抖而至於傾倒。可是不幸造出一個不澈底的新憲法出來，將全民革命上面套着一個立憲的君主，於是革命的本身，從此惘然失色了。

這一個不澈底的君主立憲，是法國革命以後挫折的總關鍵；因為反革命的勢力藉此希圖死灰復燃，而法王路易十六之逃遁與王黨勾引外力之陰謀，遂相續發露而不可復制；同時革命的陣營以內，發生各階級自顧私利的主張，而反映到立法會議中去，便促成吉龍大黨和山岳黨之權利鬥爭；等到人民憤恨王黨勾引外力的怒潮已起，各黨派就利用人民的憤怒來互相排擊，以致造成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九月以後的恐怖。所以自這新憲法頒布以後，法國革命是由全民主義轉入個人主義的時期，即是由革命趨向統一轉入革命趨向紛歧的時期。在此轉變時期的醞釀中，第一次的共和是宣布了，浸假而外力侵入與內部衝突相激而成的恐怖也發生了，表面似乎這一切都把革命怒潮激到了峯尖，而實際則革命的重心已被事勢捲向兩條路上分馳而去。從一方看，外力之援助王黨，結果不獨適所以速王黨之覆滅，而且轉使法國革命增多一重意義。因為法國革命，開始祇是單純的平民主義之革命，等到歐洲各國第一次大同盟成立，便把單純的平民主義之革命，逼出民族主義之革命的意識來了。這應該是法國革命的一個好現象，但是因為革命本身已失重心，不會能夠利用這新生的民族主義的意識，來推動平民主義的革命前進。拿破崙本來不是平民主義中的革命者，却因歐洲各國第一次同盟壓迫之來，他便被法國人民的民族

主義意識推擁而出，很快的就躍上了政治的頂巔。而他之所以能操縱法國革命，完全是由於他利用法人的民族主義意識，而暗地裏却把它們原來懷抱的平民主義擯棄得乾乾淨淨。由此可知歐洲各國對於

法國革命之同盟壓迫，其始固有以速波旁舊王室之傾覆，而其終實大有造於波拉帕脫新王室之勃興。

從他一方面看，法國革命內部的分爭和恐怖，固然使革命本身喪失統馭的能力，而於影響全歐革命思潮之傳播，倒反發生了偉大的力量。可是這樣傳播而出的革命思潮，在歐洲各國的社會本身，沒有頓時產生什麼效果，還是給拿破崙利用得來蹂躪了全歐。這兩方面的事勢，起始是分馳的，而結果都爲拿破崙一人所挾持以成其個人主義的一段史跡。時勢果然造成了英雄，而拿氏却劫持了法國革命所造成的時勢，轉以糟踏法國革命。歷史之狡獪弄人，有如此者。

再看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以後，法國革命之爲個人主義所支配，簡直是日甚一日。山岳黨屠戮吉龍大黨的慘劇未終，而山岳黨人之互相殘殺又開始。恐怖之神，管領着斷頭臺，就一直由羅蘭夫人殺到了羅伯士比。這一段史事，實千古個人主義由相爭而趨於自殺的絕好榜樣。但是恐怖過去了，法蘭西的革命得到一些什麼利益呢？絲毫也沒有的。當初爲革命主力的中等階級，已經失了領導，而附和恐怖政策的暴民，而今也掌握不住什麼權威。拿破崙懷着滿肚皮的野心躍起來組織督政府，忙的是要去併吞比利時荷蘭意大利，而且寢寢乎有征服埃及以建一世界大帝國的雄圖。然而反顧法蘭西本國的革命，佔着他半點福利沒有呢？沒有的。不但如此，他這樣利用民族主義由歐洲橫行到埃及的

帝國主義，更引起歐洲各國的第二次大同盟；在反抗這第二次大同盟壓迫的呼聲之下，他更進一步規取了法國人民的同情而躍為第一執政；最後竟於舉國歡呼之中完成了他的帝王好夢。自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以後，全歐直陷於拿破崙的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同盟決鬥之場，而法國人民遂亦麻醉在抵抗外侮的酣戰當中，幾乎盡忘了一切革命的要求和目的，從一千八百零五年的三次大同盟到次年的四次大同盟，各國亦沉溺在掠奪法國屬地與伸張歐洲霸權之中，全不注意到歐洲各小邦民族思想的潛伏勢力，將隨拿破崙的末日迫近而邁進。這時候全歐的形勢，一方面是舊的神聖羅馬帝國之瓦解，與近代帝國主義之新興，他方面是全歐民族思想之成形，而尤以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之活躍，及意大利民族獨立思想之醞釀，為最顯著。這種新形勢，本來是隨着拿破崙蹂躪全歐之鐵蹄底下的揚塵而起的，可是等到他一旦激成了全歐的民族主義，他却轉被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環攻而敗。滑鐵盧一戰的根本意義，正祇是英俄奧諸國的帝國主義，利用各國民族主義的力量把他攻倒；攻他的固是帝國主義，而所以能致他死亡的却仍是各國的民族主義。所以尋繹拿破崙一代歷史的起伏因緣，他是利用法國革命當中的民族主義去發展帝國主義的，而結果變成各國的帝國主義轉利用民族主義來撲倒他。歷史之狡獪弄人，簡直是接一連二的演了出來。

一千八百十五年的維也納會議，簡直是反動勢力額手相慶的時候。自此以後，不獨法國革命隨拿破崙之倒敗而遭失陷，即全歐之民族主義潮流，亦隨各國帝國主義之戰勝受而遏阻。我們只要看一千八

百二十二年與一千八百三十年之際的事跡，就曉得全歐反動勢力，已泛漲到最高潮。真的，歐洲大陸的復古運動，完全以梅特涅為核心。什麼四角同盟，神聖同盟，都是壓迫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壁壘。其在法國，復古主義的勢力，更發露而成波旁王室之復辟與白色恐怖的種種形態。到了查理士十世的時候，從前遭法國初期革命所傾覆的貴族和教士之舊封建勢力，皆一一捲土重來。但是舊封建勢力雖復活，而法國已非復革命初起時代的法國：從前政治的封建，有社會的封建作基礎，現在則政治的封建勢力雖可死灰復燃，而社會的封建基礎早被革命和戰爭所摧毀，已無恢復之可能；同時個人主義的工業主義，又已乘着社會的封建崩潰之機會，取其空間的位置，而代之。復古主義者並沒有看見這些事實，還是盲目地大踏步橫行起來，所以激起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七月革命，而查理士十世就被推倒。

在他一方面，這次的革命者亦同樣地沒有看清楚這些事實，估量自己的勢力過小，而估量封建勢力過大，所以經過七月的流血後，又持妥協的態度，以致造成路易腓力的君主立憲。幸而比利時德意志意大利各國的民族革命勢力，被法國七月革命所引動而日益增長，因之漸漸搖撼了梅特涅的復古主義的勢力，直接為法國革命勢力釋了不少重負，而使之從新活躍起來。這時候法國社會經濟生活之復蘇，又培植了一般中等階級起來。這些中等階級，因為所作的還是平民主義的運動，所以隱然又做了革命勢力集合的中心。這種事勢，一方面可以說是回復從前法國革命初期的狀態，他方面却又要知道它不祇是從前革命初期勢力之回復，而是新興革命勢力之擴大。因為這時候要求革命的不祇是中等階級，即勞動

階級也受了平民主義運動的宣傳，起了要求政權的覺悟。

可是不幸的很，自從拿破崙倒敗一直到現在，法國革命者對於社會經濟情形，漸漸生出了兩大派的觀察和理論。一派是只看到新興中等階級的經濟利益，所以只知夢想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一派是只看到勞動階級的經濟利益，所以就只是追求一個社會主義。這兩派的異點，經過七月革命後更日加顯著。不過這時候因為同在基佐首相的復古主義的壓力之下，兩派仍然分途努力，以期推翻君主立憲的政府，所以到了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革命，就只能作成一個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勢力分歧湊合的革命。因為它們是分歧的湊合，所以不久就生出共和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兩大政黨。尤其可笑的，就是它們甚至分別地宣布二次共和；而又忽然地選出路易拿破崙為總統；追組織臨時政府的時候，則兩黨又合作起來。這些事實，不啻說明兩派的勢力，社會主義者尚薄弱，共和主義者尚強大，但是分道而馳就敵不過殘餘的反動勢力。自此以後，法國的革命事業，反而因這三種勢力展轉離合而向後倒退，換言之，轉不若德意志和意大利兩國的民族自覺運動之日有起色。因為這時候德意志民族之統一，已有大半的成就，而意大利的自覺運動，亦已不可遏抑。梅特涅的威權，在全歐民族運動環攻之下，卒陷於傾倒。反顧法國，則路易拿破崙且由總統而登帝位；工商業之行程，且由小資產的放任主義進入大資本的帝國主義。什麼殖民政策，海上貿易，企圖到一天緊迫一天，弄到法國與英俄爭近東和全洲的霸權，參加俄土戰爭，干涉意大利的獨立。從一千八百五十到一千八百七十年，一切都表現出

一個帝國主義的法國來，彷彿以前數十年的革命事業，沒有留下半點痕跡。幸而實際上並非全然如此。因爲在這帝國主義的向外發展之下，從前八十年間民主主義積演而來的勢力，仍是伏着在政治的上層建築之下。而由新興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中所產生的勞動階級，更比從前增長了多少社會革命的力量。這兩種力量，乘着了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爆發出來，於是纔把拿破崙三世的帝政衝倒，而三次共和始告成功。

假使將這八十年反覆革命史作個總批評，我們可以說：八十年當中的平民主義革命，不過祇造成一個共和國家，而就中做平民主義革命主力的中等階級，則不特在政治上屢被反動勢力所規取，而且經濟上亦助長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發展；至若後起的社會主義革命，於政治上促成這共和的國家組織之確立是有相當力量的，然而本身所懷想的政治目的，簡直毫無成就，所以也就說不到在經濟上的收穫。社會主義者在法國革命的過程中，祇是引起了革命勢力日趨於紛歧的境界，播下了各派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相爭相詆的種子；舍此而外，是不曾造成什麼史跡的。

從這個歷史的總觀察，我們便可下一個三民主義的總論斷。近世的歷史，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連環發展的歷史。法國革命的動因，本來在於推翻植根在農業封建上面的地主教皇和國王三根撐天柱。但是自始至終，作革命的人，不曾看見他們的事業，是包含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根本問題的事業。譬如他們反抗教皇的權力，形似一個宗教問題，而不知實際就是一個民族問題。自中世紀以來，教會

是籠罩了全個歐洲的。各國的僧侶階級就是教會權力的根基。法國革命要推翻本國僧侶階級的特權，這明明是對籠罩全歐的教會權力宣戰了，如果開始即提倡民族主義來鼓舞各國的獨立運動，豈不是全歐的教會權力就可以被各國民族主義搗碎了嗎？整個教會的權力搗碎了，則法國境內的僧侶便要失所憑藉，縱是要借外力做援助，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法國革命謀推翻僧侶階級而不知從民族主義下手，這是第一個根本的錯誤。換言之，他們的錯誤，在於只知有平民主義，而不知有民族主義。等到事勢轉變出來，僧侶與貴族借外力為後援，引起各國同盟的壓迫，則事實上法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意識始發皇出來，而不幸革命內部又為個人主義所支配，致使革命領導者自相殘害，這即無異證明他們只認識平民主義而不知同時需要民族主義，所以人民方面所起的民族主義之熱情，遂給拿破崙劫取而去了。拿破崙之民族主義，又祇是一種掩護他個人暴力征服主義的幌子，至多亦不過做到一種國家主義而止，至於對內，他連他們的平民主義也都擯棄了，這是第二個根本錯誤。一直到了新興資本主義發生之後，社會主義派纔又作起社會革命的運動來。但這派人又與民族主義和平民主主義的着眼點大不相同，弄倒階級鬥爭的歧路上去，以為革命事業只是從一個單純的方面可以作得通的，這是第三個根本錯誤。這三個歷史的錯誤，就可以說明近世的革命事業，必須要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同在一整個革命計劃之下做出來，才是澈底的革命。法國革命，雖然起始是平民主義，而他們的平民主義是只有意向而無計畫的，不能與現在法國所行的民治主義相提並論，尤其不足與擬於我們今日所稱的民權主義，何況他們始

則只知有平民主義而不知有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繼則只知利用民族主義對外戰鬥，而於從前的平民主義既擯棄不用，於後來的社會主義且夢想不到；終則因一部分人傾向社會主義，使革命勢力陷於紛歧而不可復合的境域，結果只造成一個各種革命與反革命勢力湊合成功呢？

所以法國革命之不澈底，從三民主義的立場看起來是最清楚不過的。不澈底的原因，可以從兩點總括出來。第一點，它起初是平民主義的革命，而病在平民主義無具體的內容；後來是民族主義的戰爭，而民族主義轉被拿破崙變弄成了帝國主義的幌子；末了是社會主義的暴動，而社會主義的理論又別派紛歧，連暴動也變為無意義的犧牲。這些主義內容之不健全不充實，我們固然不必批評；因為主義是時代的文化所決定的東西，後人不能以此苛責前人。我所以不避煩瑣地來尋繹法國革命不澈底的原因，主意實在第二點，這就是：它自始至終所經過的行程，處處是表現着平民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三個潮流，分道而馳，前伏後起，湊合而成的一種革命，而絕非有一個革命的中心，把三個潮流總合起來，同時推進的革命。假使有一個革命的中心勢力，認識了當時革命事業是一定要解決法國的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三方面的問題，從而預定了一種整個的革命主義和方略，始終堅持着依照着它來進行，則法國革命必不至歷時若是之久，成就也不至若是之微。革命如法國之所經歷，犧牲大而成就小，費時長而進步慢，是怎樣不經濟的一番事業哩！要曉得，革命是用人力來戰勝環境的，所以就要講最經濟的方略，策最大的效能。革命，不是任環境來支配人的，所以隨時勢之播弄而冥行妄覺的亂幹，

實在是命運主義者，決不是革命主義者。命運主義者只看到自身的物質利益，或只看到一階級的物質利益，而於全社會全民族的全部利益一齊感覺不到半點痛癢，這種人縱使天天耍弄手槍炸彈，終於是命運主義底下的枉死鬼，決不能稱為革命者。積這種人所作的革命，縱以革命二字贈之，也是最不經濟的最不科學的革命。我們看了法國革命為命運主義所支配的史跡，應該了解，唯有我們中國的三民主義之革命，才是最經濟的最科學的最澈底的革命。醒石國仁兩同志編著此書，以輕快流暢之筆紀述法國革命八十年間反覆挫折的事實，不假批評而其中為命運主義所支配之關鍵；和所含歷史上革命之教訓，却自然顯映而出，這是淺白文字中見學力的作品。我們要從他們倆的筆底，認識法國革命過程中的是非功罪，作三民主義的革命之教訓，那才不失本書的真實價值。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二日劉蘆隱序於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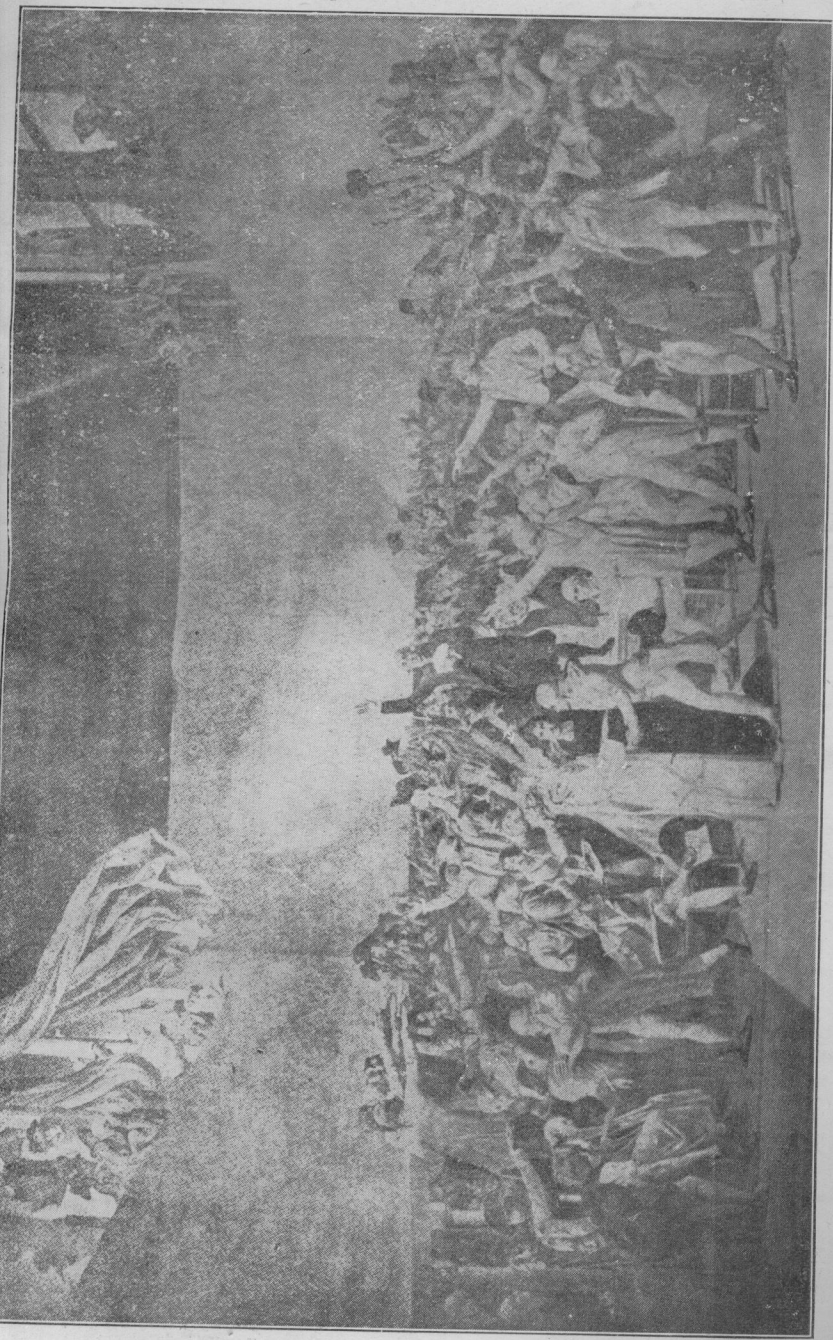


騷 盧 之 義 主 權 民 倡 提



倫保德者記聞新年少命革吹鼓

法蘭西人網球場宣言之圖





庫軍取奪民市黎奪巴

(晨清日四十月七年九八七一)